■ 往事回眸·红旗飘飘⑫

杨忠:血洒鲁北留抗日英名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本报通讯员 耿军 孟书军

在渤海革命老区机关驻地惠民县烈士陵园中,长眠着一位远近闻名的抗日英雄,他的墓碑上镌刻着"精忠报国",他率领部队开辟的游击区曾以他的名字命名为一个县,他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我省境内牺牲的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杨忠。

1941年9月4日,时任八路军115师教导6旅兼冀鲁边军区政治部主任的杨忠,反扫荡作战中在惠民县夹河战斗中壮烈牺牲。如今的烈士陵园,每年来祭祀杨忠的人很多,71岁的贾清阁已经守墓十年多了,我们从他口中了解了很多杨忠的事迹。

杨忠烈士画像

杨忠烈士墓 隋利国 摄

夹河战斗遗址

少年时代受"红都"影响

据《惠民党史》记载,杨忠,原名欧阳吉善,江西省安福县金田乡南江村人。1909年,他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欧阳方秀是个勤劳朴实的农民,早年病逝。母亲把杨忠和他的姐姐年英、妹妹友英抚养成人。

安福县紧靠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左依"红都"瑞金。杨忠自少年时代就受到党的影响,有着强烈的反对地主剥削压迫的阶级意识。稍长,杨忠担任了乡少儿部儿童团支部书记,以后又被人民推选为大桥乡苏维埃主席。杨忠积极带领贫苦农民搞土改,为了支持人民的土改斗争,他曾亲手处决了三个恶霸地主,在百姓心中赢得了尊敬和信赖。

1930年,杨忠率领大桥乡20多名青年到永新县参加了红军。同年5月,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就到了"红都"瑞金,在部队里负责宣传工作。不过,由于文化程度低,杨忠连标语都写不好,他就发奋苦学,很快就能够熟练地阅读文件,并写得一手好字。后来,和他相处的同志都说:"我们以为杨忠同志是个知识分子呢!"

1934年10月,杨忠随红三军团参加了长征,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陕北。经过这次艰苦卓绝的斗争,杨忠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到达边区后,他进入"红大"学习,后被分配到某部任民运科科长。平型关战役后,115师在晋察冀边区休整,他担任民兵工作团团长,带领工作团成员在附近几个县开展群众工作,直接动员了四五千名青年入伍。

从"红都"走出来的杨忠身经百战,勇敢沉着。据史料记载,有一次部队休整时,日寇飞机轰炸,当时杨忠正在写信,一颗炮弹落在院子里炸开,震得屋顶灰土直落。杨忠掸去纸上的尘土,若无其事地写完信交给通信员,然后才不慌不忙地收拾行装转移。

"深入虎穴"开展统战

1938年,肖华率领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进驻乐陵,收编国民党杂牌军曹振东部2000余人,改编为八路军济阳支队(七支队)。在收编过程中,杨忠凭着果敢机智,周旋于敌人的军营中,化干戈为玉帛,创造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我党我军忠于民族统战政策的范例。

当年10月,杨忠带领我党委派的政治部主任王品山、特派员刘甲英,还有李青山等12名政工人员到达曹振东部。之前,我地下党组织已经在曹部展开了工作,而杨忠等人的到来,大大振奋了曹部的抗战士气,地方党组织也更加深入地开展工作。

正当杨忠在曹振东部积极开展工作之际,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插手,他以威胁利诱的手段拉拢曹振东,委任曹为山东保安第五旅旅长。由于经不起诱惑,曹振东接受了沈的委任。在曹退掉我军委任状后,杨忠及我党派去的政工人员必须撤出,但曹振东仍愿与我军友好相处,并挽留杨忠帮助工作,他也被曹部上下称为"杨代表"。

当时,杨忠在曹部没有任何名义和头衔,但凭着他的果敢坚强,周旋于敌人军旅之中,使之合作抗战。在一年半时间里,杨忠百折不挠地对曹部进行教育、争取、团结、改造工作,促使我党思想教育在曹部产生了极大影响,到杨忠撤出曹部后,仍有些进步分子坚持与顽固势力斗争,以致促成1945年部分人员抛弃伪顽势力投降我军。

经过我党的教育和争取,曹部始终保持与我军的友好往来,不仅我军的被服厂、医务所等后勤机关住到德平一带不受其骚扰,而且曹部还抽调一些干部,分批到我乐陵军政干校接受训练。此外,曹部与八路军协同作战,也取得了一些胜利。

1940年,在鲁北抗战陷入困难局势下,杨忠奉命离开曹部,领导鲁北抗日战争。当时,盘踞在吴桥的张国基部坚持与我军为敌,其他一些伪顽势力也蠢蠢欲动。为了稳定冀鲁边区形势,杨忠与津南的周贯五紧急蹉商,南北合兵,激战13个小时,全歼张国基部3000余人。

战后,杨忠立即带领20多名骑兵,驰奔德平城西北的马家庙去会见曹振东。曹闻报后大吃一惊,问杨忠带来多少人?答曰:"如往常,骑兵二十余"。曹振东亲自出门迎接,看到杨忠和带班卫队长谈笑风生,急拉着杨忠的手说:"杨兄,迎接来迟,请谅!"

进入司令部,杨忠向曹部讲述我军打掉张国基是为国除奸、为民除害,表示愿与曹部一如既往,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以诚相见,合作抗战,不听奸人的挑拨。对于杨忠同志的忠告,曹振东连连点头称是。

浴血奋战打通"两区"

1940年5月1日,任支队司令兼政委的杨忠重新调整部署,组建新鲁北支队。整军后的第五天,杨忠召开支队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他作了《肩负起党和历史赋予的开展鲁北抗日游击战争,创建鲁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艰苦而光荣的任务》的报告,向部队号召:共产党员和八路军战士要为鲁北抗战血洒疆场,肝脑涂地!要把我党的红旗插上黄河岸!插上鹊山之巅!

当时,在我党的领导下,黄河以北建立了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黄河以南建立了清河区抗日根据地。这两片根据地虽然相距不远,但中间既有黄河隔断,又有日寇、顽军盘踞梗阻。中共山东分局和115师指挥部决定:打通"两区"的联系,使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

遵照这个指示,冀鲁边军区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南下进军。1941年2月,十六团进军德平孔家镇、徐家一带,遭日伪步骑兵3000余众截击,苦战10小时后第一次"打通"失利。3月初,十六团再次出击,遭遇日伪万余人的堵截,第二次"打通"仍未成功。

之后,杨忠率旅政治部机关、宣传大队、十七团执行了第三次"打通"任务,他沿途大造抗战声势,宣传和发动群众,并消灭了一些零星敌人。1941年9月3日,杨忠带领部队到达惠民县淄角镇、夹河一带,再进一步就可以过黄河与南岸的清河军区接头了。对于我军的大胆突破,日寇非常恐慌,急忙集结了六路"讨伐队",逐步压缩包围圈。

1941年9月4日午时,敌人偷偷包围了旅政治部机关、一营驻地夹河村和三营驻地陈、牛庄。在日、伪、顽的疯狂夹击下,杨忠带领的部队陷入了困境。突围时,机枪手中弹牺牲,杨忠拿过机枪,向敌人一顿猛扫,一下撂倒了10多个鬼子,掩护队伍冲出。杨忠突围至陈、牛庄时,三营已经转移,他在撤离的途中又遭遇日军阻击,不幸中弹牺牲……

最终,三次"打通"任务都没有实现,但我党对于打通两块根据地的决心不变。在夹河战斗后的18天,十六团改由敌人兵力薄弱的无棣县境沿海边东南行,辗转行军1863华里,经大小战斗9次,终于在9月下旬,在利津东北与清河部队会师,完成了两个地区的联系任务。

1941年10月13日,115师政治部发出电报,向总政治部报告了惠民夹河战斗的情况。电文说:"二纵队到冀鲁边区,他(杨忠)即任支队司令,辗转鲁北,坚持鲁北反扫荡战争,他在战士和群众中具有高度的威望,对鲁北根据地之创造,建树无数功勋。""杨忠的牺牲,不仅是我党我军的损失,也是国家民族的损失……"

之后不久,惠(民)、商(河)、济(阳)三边县委在淄角村建立了烈士陵园,杨忠的墓碑上镌刻着"精忠报国"四个大字。1946年12月20日,为了纪念对开辟鲁北新区做出巨大贡献的杨忠烈士,冀鲁边区决定在他率领部队开辟的游击区——商、济、惠三县交界处,新设置一个县,并命名为"杨忠县"。1949年5月,根据中央关于为纪念烈士所改县名一律恢复原名的精神,杨忠县改为惠济县,1950年5月撤消。

·相关链接·

惠民:渤海革命老区机关驻地

□ 孟书军 王红军 整理

渤海区于1944年1月由冀鲁边区和清河区合并而成,是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五大战略区之一。由于地形独特,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时,渤海区是全省唯一没有被敌人占领的地区,成为整个华东战场的大后方和物资供应基地,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关注。作为渤海革命老区机关驻地的惠民县,在战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惠民共有10700名青壮年参军,出现了很多父送子、母送儿、妻送郎、兄弟争相上前线的动人场面。仅省屯区就有12对兄弟参军,小郑家村郑风翔、郑风庭、郑风贵兄弟3人一起报名参军,朱老虎村朱文同48岁参军,80岁老母拄杖送行……

1947年2月,华东局发出了关于开展捐献活动的指示,号召解放区人民节衣缩食,支援前线,渡过难关。之后,惠民县、惠民市人民提出"要粮有粮,要钱有钱,要物有物"的口号,惠民市不到1个月就捐款800万元,惠民县城关区妇女仅50天就赶做军衣6万套。

进入1947年4月,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攻。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我军实行战略大转移,华东局和华东区机关分别从鲁中、胶东转移到渤海区惠民、阳信县一带,仅惠民一县就驻扎10万人。在负责华野西线兵团后勤供应的前提下,惠民县、市党群顾全大局,承担了转移人员的生活供应,使这些人得到较好的接待和安置。

1947年8月,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转赴豫皖苏途经惠民县,在渤海区党委驻地何家坊,陈毅向渤海区党委、行署、军区领导机关干部作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他特别表扬了渤海区的支前工作,肯定了渤海区人民对支援解放战争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支前运动已成为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作为华东地区可靠后方的惠民县、惠民市,自1947年2月至1949年底,共出支前民工10批、7205人次,出动大车7000余辆,真正做到了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1948年9月11日,惠民县组织1690名支前民工,组成"民工营",随军参加济南战役。9月24日济南解放后,这个民工团又随军参加淮海战役。10月18日,支前民工家属将1000多件棉衣送交县政府,并附慰问信、家信250余封,使得支前民工受到了极大鼓舞。

该民工营经山东、安徽、江苏、河南4省33县,随军支前4个月,执行火线抢运伤员任务。同时,该民工营还直接参与战斗,俘虏国民党士兵97名,活捉国民党邳县县长王化一,缴获美式机枪5挺、步枪115支、战马5匹,荣获"钢铁民工营"称号,有3个连被誉为"钢铁先锋连"、"英雄卓绝连"、"巩固模范连",有485名民工立功受奖。

双墩密码

2008年,安徽省蚌埠市双墩村发现的双墩一号墓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一个原本极为普通的村落,开始得到专家们的关注。然而,早在1991年,这里就有一次考古发现,同样惊心动魄,双墩村里隐藏的秘密,以及它身上的历史密码还远远没有被破译。

□1985年夏天,正值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期,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徐大立等人,来到双墩村进行普查工作。这是双墩村第一次迎接考古工作者。在这个貌似平静的村子里,徐大立打听出,这里居然有一块禁地,不许任何人进入,引起他极大的兴趣。

所谓的禁地,实际上就是村北一块高出地面3米的台地,当地人称之为乱尸岗。

刚一走近禁地,徐大立就惊呆了。地表上到处都是破碎的陶片和蚌壳,还有不少动物的骨骼散落其中。他们当时就确定这是一个早期的新石器时期的遗址。

文物普查结束后,蚌埠市博物馆便于1986年对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之后,1991年与1992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进行了两次正式发掘。三次发掘面积共375平方米。

徐大立介绍:发掘面积不大,但是发掘出来的出土文物,数量相当惊人。

考古人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蚌器和骨角器,经过检测,这些文物竟然有7000年左右的历史。这让考古人员异常兴奋,因为在淮河中游地区,这是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遗址。大家谁也没想到,双墩村居然在7000年前,就开始有远古人类的活动了。

在出土的所有文物中,一个7厘米高的陶塑人头像最为特殊,因为只此一件,所以格外引人注目。

它的塑造手法粗犷、简练,五官雕刻细致入微,写实中透着夸张,让人很难想象7000年前的双墩人是如何将它造就。

陶塑人头像的额头上雕刻着两个同心圆,嘴角微微上翘,让人感觉似笑非笑。与它对视,任何人都会感觉到它透着的神秘,也会惊叹于7000年前双墩人那精湛的雕刻技艺。

在双墩遗址出土的文物中,还有两件陶塑品也同样令人称奇。

一件是一头陶塑野猪。长长的猪嘴、圆圆的猪眼,样子憨态可掬。身体的线条流畅、简练,各部位比例协调,充分体现了古双墩人敏锐的观察力。

根据它下端的短柄,专家猜测,它可能是某个器物上的一个把手,主要起着装饰的作用。

还有一件牛型托盘。古双墩人巧妙地利用了牛身的空间,将之设计成一件放置物品的器皿,既有观赏性,又有实用性,其聪明才智可见一斑。

在双墩遗址中,考古人员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这些陶器基本分为三大类:贮藏器、炊煮器和饮食器,造型各异、种类繁多。

徐大立介绍:这么丰富的陶器组合,在一个遗址里面出现,表明双墩遗址的先民们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生活是比较稳定的,只有在稳定的生活状态下,他们才能有时间和能力来做各种各样不同的炊煮器和食器。

出土的两件彩绘陶罐

出土的蚌锯

出土的部分刻画符号

还有一件陶器,有四个流口,被称为四流器,只出土了一件。可以看出,它不同于一般的实用型陶器,造型非常独特,目前在其他古文化遗址中还未被发现。

在双墩遗址中,还出土了这样几件特殊的陶器,它的形状酷似男根,被专家称为陶祖。

徐大立介绍:它是三个支架,支腿埋在土里,上面支锅放上去,然后底下加火可以烧。

徐大立说:7000年左右的部落氏族一般还处在母系氏族阶段,在这个氏族阶段大部分出土的东西,应该都以女性的特征为主,但是这个遗址恰恰出土了一批以男性特征为主的文物。

虽然双墩遗址没有出土带有女性特征的器物,但并不表示它不是母系氏族的社会。由于三次挖掘的总面积较小,没有发现古双墩人的墓葬区、居住区和祭祀区,所以双墩部落到底是母系还是父系氏族,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根据以往的考古经验,像这种7000年前的新石器遗址,应该会出土大量的石器,但恰恰相反,双墩遗址出土的石器非常少,而且有一件石器让所有参观过的人都惊呼不已。

这是一件直径20厘米、厚3厘米左右的石圆饼。它厚薄均匀、表面光滑润洁,微微泛出石头的光泽,猛一看上去,会让人联想到田径比赛中的铁饼。考古学家都不敢想象,当时的人会有这么高的技艺水平,能把这个圆饼做得这么规范,厚度均匀,磨得非常光滑。

石圆饼的出土让考古学家看到了古双墩人的智慧,这种智慧让现代人错愕、惊奇,问题也随之而来,古双墩人倾心费力地打磨这个圆饼,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徐大立介绍:一个比较通行的猜测认为,它是一个制作陶器的慢轮。这里出土的陶器、陶碗都非常规整,而且器形很一致。

实际上,双墩遗址没有出土大量的石器并不让人难以理解,因为在后来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许多蚌器,对于居住在淮河岸边的古双墩人来说,蚌类食物丰富,对蚌壳的打磨显然比对石器的打磨要容易很多。

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非常精美的蚌器,它的一边是锯齿,另一边是刀刃,两种功能复合在同一件器物上,这又是古双墩人聪明智慧的另一体现。

除了蚌器外,由动物骨头制作的骨器也大量发现。一种酷似靴子的鹿角勾形器在遗址中出土最多。专家推断它应该是采集工具。

□7000多年前,古双墩人就是利用这些劳动工具和生活器物,在淮河流域生息繁衍。他们不仅制作了让现代人惊叹的劳动工具,同时还留下了一个旷世之谜,那就是遗址中出土的600多个刻画符号,数量之多,令人震惊,这在我国目前的考古发现中还是第一次。

不过,让人奇怪的是,这些符号几乎都出现在同一个部位,那就是陶器的底部,并且都刻画在直径8厘米左右的食用碗底上。

为什么所有的符号都刻画在同样大小的碗底呢?这个谜无人知晓。为了研究它们,蚌埠市博物馆的徐大立辞去了馆长的职务,将自己所有的时间都倾注在了这些符号身上。十几年来,他每天都与陶片对话,试图解析其中的含义。

徐大立介绍:双墩遗址的刻画符号所反映的内容、内涵非常丰富,包括狩猎、种植、采集、编织、住房,还有一些是记录水文和天气情况的。这些符号一部分是象形的,一部分是几何类符号,但都是可以会意的。

在徐大立看来,这些刻画符号就像是一个原始社会的"档案馆",带领着他去探寻7000年前古双墩人的生活原貌。

破解符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徐大立却乐此不疲。经过多年的研究,他从符号中发现了古双墩人居住的房屋。

这种建筑被专家称为杆栏式建筑,对于生活在淮河岸边的古双墩人来说,这种杆栏式建筑与地面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可以很好地隔离潮湿、保持干燥。

在依水而居的古双墩人眼中,水,是最重要的。因此,他们对于水纹的刻画明显多于其他。徐大立发现,在刻画水势大小的时候,他们往往会用弧线线条的多少来表现,从一条到五条,形象地展现了洪灾泛滥的过程,也表明古双墩人已经有了数的概念。

徐大立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这些刻画符号除了单体符号外,还有许多组合型符号,比如四叶花与三角,还有渔网与弓箭的搭配,形象地表明了双墩部落是一个以渔猎经济为主的社会。

在研究的过程中,徐大立还发现,这600多个符号中有动物、有植物、有抽象的几何符号,但惟独没有人的形象。后来经过研读和分析,徐大立恍然大悟:这些符号所表现的内容和场景,都是用人的目光去注视的,它主要表现人对物的关系,观察社会、自然等这些现象中所记录下来的东西。基于这样的理解,徐大立认为,这些刻画符号实际具备的真正功能应该是教育,也就是教导部落里的人如何狩猎、如何捕鱼、如何观察天象等。所以,它们会被刻画在大小相同的碗底上,就像一本本规格标准一致的图书。

□对于大多数看过双墩刻画符号的人来说,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符号看起来自成体系,会不会是中国早期的文字呢?

在学术界,国际上公认的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甲骨文,距今3000多年,至于它是如何演变而来的,一直是专家们探索的重要课题。现在,双墩遗址出土的这600多个刻画符号,由于数量巨大,内容丰富,因此成为专家们探索中国文字起源的最佳切入点。

那么一种古老的符号,如何才能知道它是否记录了语言呢?

安徽大学校长黄德宽介绍:那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这个符号不是以孤立的方式出现,它往往会有一种成组的符号,这种符号按一定的顺序排列。我们可以反推,一般成组按顺序排列的符号,往往会形成一个表达系列的意思,前后有一个连接,当然这个连接完全是从语音上和语言能对应上,那么它就是成熟的文字符号体系。

除此之外,要判断一种古老的符号能否成为文字,还有其它一些衡量标准。

黄德宽介绍:首先有没有城市出现,这个城市的规模有多大,一般要五千人以上才叫一个城市。就是有相当数量的人,聚集形成了固定的居住点。而城市当然就得有建筑,在这样一个城市里面有没有大型的仪式性建筑,比如祭祀性的建筑出现,说明它的意识形态就发展到一个比较高的层面。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文字符号在遗址中出现,同时所在的遗址有大量的建筑物,也有一定规模的人口,就可综合判断。

显然,对于双墩遗址来说,由于发掘面积很小,而且没有发现居住区与墓葬区,缺失的信息太多,因此给专家判断双墩刻画符号是否为远古文字,增添了一定的难度。不过,仅就刻画符号本身而言,专家认为这些符号显然已经具备了简单的记事功能,并且在离双墩遗址30公里的侯家寨遗址中也有发现,说明双墩刻画符号在当时已经在淮河中游地区流传,具备了文字社会性的特点。但是还不能说,它已经发展到一种文字系统,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这一点。

这些神秘的刻画符号像一部远古的天书,让专家们捉摸不透。在中国,除了甲骨文外,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掘中发现数量最多的符号,那么这些刻画符号究竟和甲骨文有没有关系呢?

徐大立介绍:我们不可能把七千年前的符号一下子和三千年前的符号文字连起来,只能说双墩刻画符号的这些文字特征,是中国文字的源头之一。

看来,要想判断双墩刻画符号最后的性质,还需要考古的进一步发现。不过,即便它们不是真正的文字,单从艺术的角度而言,这些简单的线条,也让我们充分领略了7000年前古双墩人的聪明与智慧。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600多个刻画符号所记载的远古信息,必将会穿越时空,让现代人了解与洞悉,围绕在双墩村里的历史密码也必将会被后人所破译。

(央电视台10套《探索·发现》栏目供本报专稿)

探索·发现